

#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刘于琪<sup>1</sup>，李志刚<sup>1</sup>，刘晔<sup>2</sup>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2.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香港新界沙田，00852)

**【摘要】**新世纪伊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城市化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大批新移民迁移到大城市，其在大城市的定居与融合已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亟需深入探讨。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六城市所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内部出现分化，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城市生活评价和地理因素等方面。其中，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所在城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关键词】**新移民；定居意愿；影响机制；Logistic 回归分析

## Status Quo and Mechanism of New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China

**Abstract:** During last decades, millions of rural migrants move away from rural areas and pour regions into large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in China. The literature of migration in China noted the unprecedented scale of this migrant wave. Few, however, are known about the extent and mechanism of migrants' propensity to stay or leave cities. Based on a large-scale survey in six large cities: Guangzhou, Dongguan, Shenyang, Chengdu, Hangzhou, and Zhengzhou, using the approaches of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pensity of migrants to stay in cities and discloses underlying mechanisms. First, it is found that most migrants hold strong intention to stay in citie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rked variegation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migrants. We identified three types of migrants, and found that, for example, investor migrants hold the strongest intention to stay, followed by intellectual migrants, whilst the propensity of labor migrants is the weakest. With model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it is articulated that in general the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staying include Hukou status, social network, lev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details,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llectual migrants to stay include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migrants include professional category, property right, social capital, social integration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that of investor migrants include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Hukou statu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vide diversified ways of social integration for the migrants,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enact social and spatial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migrants.

**Keywords:** second generation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fluence mechanism,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0971095, 4113074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ESRC/DFID 资助项目 (RES-167-25-0448);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批准号 07JZD00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融合研究”(11JJD840015) 资助;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 项目名称:《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研究》, 项目编号: 11JZD028

作者简介:

刘于琪(1988-), 女, 广东中山人, 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社会地理

邮箱: lliuyuqi@hotmail.com

李志刚(1976-), 男, 湖北天门人,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青工委副主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博士, 本文通讯作者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社会地理

邮箱: lizhig@mail.sysu.edu.cn

刘晔(1986-), 男, 广东广州人,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人口地理

邮箱: liuyeliuyewin@126.com

## 1 引言

伴随着中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大批新移民涌入大城市<sup>[1-2]</sup>。进入 21 世纪，1980 年后出生的新生代逐渐成为新移民的主体<sup>[1-2]</sup>。新生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意愿更强烈，其落叶归根的观念也更为淡薄<sup>[3-4]</sup>。然而，由于城乡分割、户籍藩篱、社会排斥和歧视的存在，及迁移者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新移民在流入地仅维持一种暂居的状态，未能实现向所在城市永久居民的转变。近年来，“蜗居”、“蚁族”和“逃离北上广”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反映解决新移民定居问题的紧迫性。因此，有必要探讨新移民在大城市定居的意愿及其机制，从而为推动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参考。

与八九十年代相比，当前人口迁移的主体呈现一些新的特征。例如，新移民特别是新生代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有所提升，其外出的目的也从纯粹的赚钱养家糊口走向多元，更多考虑到个人发展和生活水准等因素<sup>[3-5]</sup>。研究表明，不同类型新移民的住房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市场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因素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sup>[6]</sup>。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的趋势，不再囿于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sup>[5, 7]</sup>。新移民的迁移模式趋向多元，存在定居城市、循环流动和返回家乡等多种模式，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流入地定居<sup>[8-10]</sup>。总而言之，新移民群体内部已经出现分化，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认同、居住模式、社会网络、流迁模式以及迁移目的等多个方面<sup>[6, 10-12]</sup>。

前人研究从社会学、人口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测量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定居意愿。已有文献中常用的指标包括“出售老家房产”<sup>[13]</sup>、“落户城市”<sup>[14]</sup>以及“长期定居城市”<sup>[15]</sup>等。部分学者测度了整个流动人口群体的定居意愿，结果显示，希望在迁入地定居的迁移者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14%-27.4%<sup>[16-17]</sup>。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希望留在迁入地城市发展和定居。同时，也有一部分迁移者在定居决策方面仍然举棋不定。例如，朱宇<sup>[17]</sup>的调查显示，高达 25.9%的受访者“对未来归属地难以决定”。

迁移者的定居意愿受到迁移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制度、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sup>[9, 18]</sup>。首先，女性、未婚、高学历、高收入、从事正规职业、在迁入地购房以及以家庭为单位迁移的迁移者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sup>[9, 18-19]</sup>。其次，户籍壁垒一向被认为是阻碍外来人口在迁入地定居的重要因素<sup>[14, 18]</sup>。然而，部分学者指出，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户籍对人口流动和定居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弱化，市场和迁移者自身因素的作用逐渐凸显<sup>[9, 15, 20]</sup>。第三，倘若迁移者在迁入地的社会资本越大，所获的社会支持越多，其更容易在迁入地定居，定居的意愿也更强烈<sup>[20-21]</sup>。此外，对迁入地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能强化迁移者的定居意愿<sup>[22]</sup>。然而，大部分的前人研究仅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新移民内部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事实上，到异地求职和经商的大学毕业生以及经营者的数量正迅速增多，其特征和传统的农民工有较大的差别。

为此，本文将以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六个城市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的数据，探讨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以及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分化。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下的问题：城市新移民是否愿意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其定居意愿受什么因素的影响？不同类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第二部分介绍了数据来源以及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进入实证，测量新移民总体及三类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对自身定居能力的主观评价；第四部分构建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分析模型，探讨不同类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最后一部分进行总结和讨论。

## 2 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所搜集的一手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数据。课题组于 2008 年 11 月-2009 年 4 月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六个城市组织问卷调查。案例城市的选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上述六市分别为华南、华东、东北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典型城市，也是各地区主要的外来人口集中地；另一方面，结合调查开展的现实条件，如案例城市是否有研究合作者等等。问卷含 82 条问题，涵盖住房、就业、社保、社会生活、城市管理、社会认同和个人基本状况等 7 个方面。本调查的新移民样本为在案例城市定居两年或以上的外来迁移者，不包括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调查对象分为三类：智力型新移民、劳力型新移民和投资型新移民。智力型新移民指受过高等教育（大专或本科教育），现在本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劳力型新移民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高中学历或以下），在制造、商贸、流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投资型移民，是指拥有小企业、小作坊、商铺、饭馆等产业的新移民。本研究采用“是否愿意在所在城市长久定居”这一指标测量定居意愿。

课题组采用配额抽样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城市收集样本 550 份；智力型移民，劳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配额为 150:200:150；调查共派发问卷 3300 份，回收 3234 份，获得有效问卷 3168 份，问卷有效率 96%。同时，课题组采用滚雪球法寻找受访者，即通过既有调查对象寻找新的调查对象，每个调查对象最多推荐 3 位新的调查对象，依次滚动，并尽量避免样本过分集中在某个年龄段、性别以及职业类别。滚雪球法的缺点为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不足，优点为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大量具有相同社会经济特征的研究目标，因此适用于本次调查。三类新移民中，智力型新移民主要调查已完成学业的大学生群体，分布于城中村、单位宿舍以及居住小区等地；劳力型新移民主要调查制造业、服务业及其它行业的农民工；投资型新移民的主要调查对象为小业主，调查地点为各专业市场、工厂区、商场、食肆等。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为（表 1）：平均年龄为 28 岁，智力型新移民相对于其他两个群体更年轻；智力型和劳力型新移民以未婚者居多，而投资型新移民大部分已成家；三类新移民的本市户籍持有率很低，尤其以劳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为甚；智力型新移民的文化程度为大专或以上，劳力型新移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以下，投资型移民介于两者之间；职业方面，新移民的职业层次较低，大多从事一般职员等类型的工作，三类群体的职业结构差别不大；收入方面，新移民的月可支配收入主要介于 1000 到 3000 元之间，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收入水平高于智力型新移民，而后者高于劳力型新移民；就住房模式而言，新移民以租住为主，投资型新移民的住房自有率最高。

表 1 六市新移民的基本特征

Table 1 Socioeconomic profiles of new migrants in the six cities

		全体新移民	智力型移民	劳力型移民	投资型移民
样本数量（个）		3168	984	1320	864
年龄（岁）	均值（Mean）	28	26	27	32
在本市生活的时间（年）		3.44	3.18	3.37	3.78
婚姻状况（%）	未婚/离婚/丧偶	59.12	80.79	61.09	31.45
	已婚	40.88	19.21	38.91	68.55
户口（%）	非本市户籍	88.05	73.30	96.45	91.66
	本市户籍	11.95	26.70	3.55	8.34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1.50	0.00	48.03	41.78

	高中（包括中专）	30.52	0.00	51.97	34.72
	大专及以上	37.98	100.00	0.00	23.50
迁移经历 (曾工作过的城市: 个)		1.53	1.46	1.34	1.58
职业 (%)	专业人士	9.01	4.82	12.13	9.83
	个体工商户/自我雇佣	25.34	35.23	17.62	15.32
	管理人员	4.12	2.83	5.32	3.72
	其他人员	61.53	57.12	65.03	71.13
经济收入 (元/每月)	无收入	1.00	1.05	1.32	0.30
	<1000	13.63	7.01	22.52	7.71
	1001-3000	65.82	67.03	73.63	52.92
	3001-5000	13.23	18.81	2.02	23.74
	>5001	6.32	6.10	0.51	15.33
住房状况 (%)	自有住房	11.45	13.67	6.21	17.18
	非自有住房	88.55	86.33	93.79	82.82

### 3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一半的新移民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定居”的说法, 显示其强烈的定居意愿(表 2)。其中, 愿意在所在城市长久定居的新移民高达 58.80%, 选择“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的只占新移民总数的 18.72%, 表示难以做出决定的新移民比率仅为 3.10%。就三类不同类型的新移民而言, 高达 64.47%的投资型移民愿意在所在城市长久定居, 智力型移民次之(62.71%), 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52.19%)。同样地, 23.72%的劳力型移民不愿意在所在城市定居, 高于投资型移民(17.82%)和智力型移民(12.71%)。

表 2 新移民对“我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定居”说法的认同程度 (%)

Table 2 The choices on question “I want to settle down in this city” of new migrants (%)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说不清	合计
全体新移民	9.31	49.49	19.38	15.56	3.16	3.10	100
智力型移民	10.98	51.73	22.85	9.86	2.85	1.73	100
劳力型移民	8.33	43.86	20.00	20.08	3.64	4.09	100
投资型移民	8.91	55.56	14.47	15.16	2.66	3.24	100

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新移民从外出就业到定居城市是一个主体和结构二重化的过程<sup>[23]</sup>。在迁移者自身能动性与外部结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新移民在定居城市、循环迁移或最终返乡三者之间做出选择, 继而付诸行动。定居城市是新移民出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做出的迁移决策, 隐含了选择主体对定居城市能力的评价<sup>[8]</sup>。表 3 为新移民对其自身定居能力的主观评价。数据显示, 38.19%的新移民认为自己有能力在所在城市定居, 低于有意愿在所在城市定居受访者的比例。其中, 50.30%的投资型移民和 46.10%的智力型移民认为自己有能力在所在城市定居, 远远高于劳力型移民(23.74%)。Spearman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 新移民的定居能力和定居意愿的相关性较弱, 相关系数仅为 0.35。其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 大部分新移民渴望定居城市但是缺乏定居能力, 匮乏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使

得新移民无法在城市立足。另一方面，有部分新移民具备定居能力却又不愿意定居城市，反映了制度、社会和文化壁垒的制约作用。

表 3 新移民对“我有能力在这个城市定居”说法的认同程度（%）

Table 3 The choices on question “I am able to settle down in this city” of new migrants(%)

	非常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说不清	合计
全体新移民	6.87	31.32	26.54	27.38	4.87	3.02	100
智力型移民	9.04	37.06	32.30	17.01	2.11	2.58	100
劳力型移民	3.72	20.02	26.32	38.76	7.31	3.87	100
投资型移民	8.28	42.02	20.64	22.13	3.61	3.32	100

我们进一步考察户籍和公共服务等政策因素对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表 4）。排除政策因素后，有 64.87% 的新移民愿意在迁入地定居，比考虑政策因素的情况下提高 6.07%。其中，智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提高幅度较大（14.42%），劳力型移民（2.58%）和投资型移民（1.85%）的提高幅度较小。由此可见，政策因素对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两类新移民而言，智力型移民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更稳定的职业，对在所在城市的发展也更有信心。相对而言，来自于农村的劳力型移民大多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家乡拥有土地，即使有机会能获得城市户口也宁愿在城市维持一种暂居的状态<sup>[24]</sup>。

表 4 新移民对“如果政策允许，是否考虑购房落户”说法的认同程度（%）

Table 4 The choices on “Are you going to buy an apartment and transfer your hukou,if related policies permit it” of new migrants(%)

	愿意	愿意，但是不敢想	不愿意	没必要	其他	合计
全体新移民	64.87	17.77	10.10	7.10	0.16	100
智力型移民	77.13	11.69	7.22	3.86	0.10	100
劳力型移民	54.77	23.03	12.42	9.62	0.15	100
投资型移民	66.32	16.67	9.84	6.94	0.23	100

#### 4 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分析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因素，我们参照前人研究，把全体新移民划分为定居者和非定居者两个组别<sup>[9, 18, 20]</sup>。具体而言，对于问卷中“我愿意在这个城市定居”的说法，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的受访者划归为定居者，选择“一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受访者划归为非定居者，选择“说不清”的受访者被剔除出模型。我们将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迁移经历、制度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理因素八个方面比较定居者和非定居者的差别（表 5）。

表 5 定居者与非定居者特征分析

Table 5 Feature analysis of stay migrants and leave migrants

变量	定居者	非定居者	变量	定居者	非定居者
<b>人口学特征</b>			<b>制度因素</b>		
性别（%）			户籍（%）		
男	47.2	53.7	本市户籍	15.5	6.8

女	52.8	46.3	外地户籍	84.5	93.2
年龄 (岁)	28.4	27.8	与本地人的公共福利差异 (%)		
婚姻状况 (%)			基本一致	43.2	33.7
未婚/离婚/丧偶	59.2	60.0	有很大差异	56.8	66.3
已婚	40.8	40.0	<b>社会网络</b>		
<b>社会经济特征</b>			居住在本市内的好朋友数量 (个)	2.0	0.0
文化程度 (%)			与本地人的交往状况 (%)		
初中及以下	28.6	34.6	至少有一个好朋友是本地人	11.4	7.0
高中和中专	29.4	32.2	没有	88.6	93.0
大专及以上	42.0	33.3	<b>社会认同</b>		
职业 (%)			对本市语言的熟悉程度 (%)		
专业人士	8.9	9.5	能听又能说	75.6	61.3
个体工商户/自我雇佣	27.0	23.0	能听不能说	21.1	31.3
管理人员	3.7	4.7	不能听又不能说	3.2	7.4
其他人员	60.4	62.9	与本地人生活方式的差异 (%)		
个人收入 (%)			大致一致	14.8	5.7
1000 元以下	13.7	15.8	不一致	85.2	94.3
1001-2000 元	45.2	51.1	对自己身份的看法 (%)		
2001-3000 元	18.9	17.7	本市人	15.4	3.2
3001 元以上	22.1	15.4	非本市人	84.6	96.8
住房产权 (%)			与本地人相比是否平等 (%)		
居住在自有住房内	14.7	7.1	平等	47.3	28.0
居住在非自有住房内	85.3	92.9	不平等	52.7	72.0
<b>迁移经历</b>			<b>生活满意度</b> (满分 100 分)	57.9	51.8
在本市定居时间(年)	3.5	3.3	<b>地理因素</b> (%)		
			东部(广州/东莞/杭州/沈阳)	57.1	42.9
			中西部(郑州/成都)	67.9	32.1

和非定居者相比, 定居者主要以女性为主 (52.8%), 文化程度较高 (大专及以上学历达到 42%), 收入较多 (月收入 3001 元以上达 22.1%), 住房自有率较高 (14.7%)。就制度因素而言, 定居者在本市户籍拥有率 (15.5%) 以及本地公共福利享有率 (43.2%) 方面均高于非定居者。就社会网络而言, 有意向定居的新移民在迁入地城市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不仅在本地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2 个), 与本地人的交往也更为密切 (11.4% 的定居者和本地人成为好朋友)。本文从语言、生活方式、身份和社会地位等四方面探讨社会认同感对定居意愿的影响作用。定居者对当地语言的熟悉程度较高, 75.6% 的定居者对当地语言“能听又能说”, 高于非定居者 (61.3%); 相对于非定居者 (5.7%), 定居者 (14.8%) 的生活方式和当地人更接近; 身份认同方面, 15.4% 的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只有 3.2% 的非定居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社会地位方面, 47.3% 的定居者认为自己和本地人平等, 远高于非定居者 (28.0%)。由此可见, 定居者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状况明显优于非定居者。生活满意度方面, 定居者 (57.93 分) 的评价明显高于非定居者 (51.93 分), 其在本地定居的能力也更强。而地理因素方面, 67.9% 的新移民希望留在中西部城市定居, 远高于东部的非定居者 (57.1%)。

我们进一步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 并依新移民的类型分别建立四个模型。选取受访者的定居意愿为因变量, 如果受访者“愿意或非常愿意在所在的城市定居”则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模型的自变量涵盖表 5 所示的八大类 18 个指标,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6 所示。

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个人收入对全体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年龄”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反映年龄越大，定居意愿越强。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新移民外出时间更长，可能已经较为适应现有的生存环境，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人脉（叶鹏飞，2011）。其中，投资型移民的分析模型明显受到年龄因素影响。“性别”与定居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男性的定居意愿仅为女性的 77.6%。而这种变量关系同样存在于智力型移民和投资型移民的分析模型中。“文化程度”与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大专及以上”样本的定居意愿是“初中及以下”样本的 1.219 倍。文化程度的影响作用在模型四中尤为明显，“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和中专”样本的定居意愿分别为参照组的 2.257 倍和 1.525 倍，但在模型一和模型三中不显著。“个人收入”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与参照组相比，当新移民个人收入达到 3001 元以上，其定居意愿达到 1.54 倍。当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时候，“婚姻状况”、“职业”和“住房产权”对总体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新移民的职业层次和住房自有率普遍较低。例外的是，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受到“职业”和“住房产权”的显著影响：个体商户和自我雇佣者的定居意愿是其他职业从事者的 1.451 倍，而房产拥有者的定居意愿是租房者的 2.219 倍。

在制度因素方面，“户籍”与全体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拥有本地户籍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是没有本地户籍新移民的 1.475 倍。同样地，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也受户籍因素的显著影响，但劳力型移民不受户籍因素的影响。“公共福利差异”对总体新移民、劳力型移民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仅与智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存在较弱的负相关。这说明智力型移民比其余两类移民考虑更多公共福利方面的因素。

在社会网络方面，“居住在本市内的好朋友数量”和“与本地人交往状况”均能显著提高新移民在本市的定居意愿。对于所有新移民而言，在本市内每增加一位好朋友，其定居意愿提高 12.1%。如果好朋友中有本地人，其定居意愿更会提高 38.7%。社会网络在其余三个模型当中均发挥显著作用。其中，劳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主要受“好朋友数量”的影响，而智力型移民则主要受“与本地人交往”的影响。可见，前者在城市的社会关系偏重于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的传统社会网络，但与本地人之间仍存在社会隔阂<sup>[11]</sup>，后者则致力于与本地人交往，通过本地化社会网络的建立，实现在迁入地扎根。

在社会认同方面，四组变量均与全体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反映社会心理因素是新移民迁移决策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模型一显示，新移民对本市语言越熟悉、其生活方式越接近于本地人、越具有本地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拥有本地人的社会地位，其在本市定居的意愿则越强烈。相对而言，社会认同因素在模型二（智力型移民）和模型三（劳力型移民）也十分显著，而在模型四中仅有“对本市语言熟悉程度”一项与因变量有显著关系，反映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较少受社会认同感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探讨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差异。结果显示，对全体新移民而言，东部城市样本的定居意愿仅为中西部城市的 68.7%。这可能是因为广州等东部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很高，获得当地户口的难度很大，与中西部城市相比具有更高的进入门槛。不少新移民到这些城市只是抱着一种打工的心态，有一定积蓄后便回到家乡或到其他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相对于劳力型和投资型移民而言，智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较少受地域差异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仅支付能力更高，也更容易获得当地户口。此外，东部大城市在文化娱乐和消费方面领先于中西部城市，智力型移民在这方面的需求更高，因此偏好于在东部城市定居。

其他方面，“迁移经历”与因变量呈现正相关，随着新移民在本市定居的时间增加，其定居意愿也不断提升。但是，这种变量关系仅存在于总体分析模型和劳力型移民分析模型中。在四个模型中，“城市生活满意度”与新移民定居意愿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即新移民对在所在城市的生活越满意，其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烈。



表 6 新移民定居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6 Logistic regression of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new migrants

因变量（愿意=1，不愿意=0）	模型一 全体新移民定居意愿模型			模型二 智力型移民定居意愿模型			模型三 劳力型移民定居意愿模型			模型四 投资型移民定居意愿模型						
	B	S. E.	Exp (B)	B	S. E.	Exp (B)	B	S. E.	Exp (B)	B	S. E.	Exp (B)				
年龄	0.015	**	0.007	1.015	-0.025	0.025	0.976	0.008	0.010	1.008	0.031	**	0.013	1.032		
性别（参照组=女）	-0.254	***	0.083	0.776	-0.444	***	0.156	0.641	-0.045	0.127	0.956	-0.370	**	0.175	0.691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离异/丧偶）	-0.042		0.115	0.959	-0.019	0.238	0.981	0.039	0.176	1.040	-0.141		0.230	0.869		
文化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和中专	0.067		0.105	1.070				-0.061	0.131	0.941	0.422	**	0.192	1.525		
大专及以上	0.198	*	0.114	1.219				-0.392	0.424	0.676	0.814	***	0.252	2.257		
职业（参照组=其他人员）																
专业人士	0.060		0.141	1.061	-0.278	0.345	0.757	0.240	0.190	1.271	-0.066		0.280	0.936		
个体工商户/自我雇佣	0.104		0.098	1.110	-0.129	0.159	0.879	0.372	**	0.162	1.451	0.171		0.229	1.186	
管理人员	-0.086		0.202	0.918	-0.320	0.435	0.726	0.084	0.274	1.088	0.022		0.430	1.022		
个人收入状况（参照组=1000 元以下）																
1001-2000 元	0.078		0.122	1.081	0.371	0.282	1.449	0.015	0.157	1.015	-0.228		0.316	0.796		
2001-3000 元	0.203		0.147	1.225	0.244	0.310	1.277	0.098	0.232	1.103	0.186		0.334	1.204		
3001 元以上	0.432	***	0.155	1.540	0.564	*	0.327	1.758	-0.175	0.405	0.839	0.254		0.325	1.289	
住房产权（参照组=居住在非自有住房内）	0.171		0.148	1.187	-0.368	0.247	0.692	0.797	***	0.301	2.219	0.103		0.276	1.108	
在本市定居时间	0.092	**	0.038	1.097	0.112	0.074	1.118	0.101	*	0.057	1.106	0.087		0.077	1.091	
户籍（参照组=外地户籍）	0.389	**	0.153	1.475	0.368	*	0.193	1.445	0.303	0.430	1.355	1.094	**	0.473	2.987	
与本地人的公共福利差异（参照组=有很大差异）	-0.039		0.089	0.962	-0.286	*	0.163	0.751	-0.027	0.134	0.973	0.237		0.197	1.267	
居住在本市内的好朋友数量	0.115	***	0.037	1.121	0.048	0.073	1.049	0.417	**	0.246	1.518	0.281	***	0.075	1.324	
与本地人的交往状况（参照组=没有本地人朋友）	0.327	**	0.147	1.387	0.583	**	0.274	1.791	0.077	0.057	1.081	-0.224		0.273	0.799	
对本市语言的熟悉程度（参照组=不能听又不能说）																
能听不能说	0.364	*	0.195	1.439	0.435	0.348	1.545	0.559	*	0.328	1.749	0.273		0.372	1.314	
能听又能说	0.751	***	0.191	2.120	0.855	**	0.346	2.351	0.850	***	0.322	2.340	0.890	**	0.363	2.434
与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差异（参照组=不一致）	0.366	**	0.153	1.441	-0.043	0.262	0.958	0.620	**	0.244	1.859	0.517		0.329	1.677	
对自己身份的看法（参照组=其他，包括不清楚）	0.953	***	0.189	2.593	1.070	***	0.270	2.915	1.063	***	0.355	2.896	0.666		0.443	1.947

自己和本地人是否平等（参照组=不平等）	0.395	***	0.088	1.485	0.495	***	0.165	1.640	0.425	***	0.136	1.529	0.139	0.179	1.149	
生活满意度	0.082	***	0.008	1.085	0.144	***	0.018	1.155	0.057	***	0.013	1.059	0.063	***	0.016	1.065
城市（参照组=中西部城市）	-0.375	***	0.095	0.687	-0.179		0.183	0.836	-0.337	**	0.146	0.714	-0.508	**	0.198	0.602
Constant	-4.167	***	0.426	0.016	-5.540	***	1.780	0.004	-3.425	***	0.615	0.033	-4.005	***	0.839	0.018
Model Chi-Square	478.651	***			198.295	***			160.302	***			177.587	***		
-2 Log likelihood	3634.144				1067.564				1584.826				887.126			
Percentage Correct (%)	67.4				72.6				64.1				72.6			
样本量	3069				967				1266				836			
自由度	24				24				24				24			

注：“\*”、“\*\*”、“\*\*\*”分别代表 P<0.1、P<0.05、P<0.01

综上所述,研究表明,女性、高学历、高收入、在本市居住时间较长、拥有本地户籍和一定社会资本、具有本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生活满意度较高以及以中西部城市为迁入地的新移民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其中,收入、户籍、社会网络、社会认同和地理因素等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较高,反映了它们是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模型二至模型四显示,三类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已出现分化。就智力型移民而言,性别、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因素对定居意愿的影响最突出,而个人家庭特征、迁移经历、制度以及地理等因素的作用相对较弱。这是因为智力型移民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适应能力,更容易获得本地户口并与本地人建立社会关系,对其个人发展的前景也较为乐观,因此在定居决策的时候更偏重于迁入地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包容性,对当前的户籍状况和经济状况相对不太重视。就劳力型移民而言,职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认同以及所在城市等方面的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这反映了对于低学历的外来工而言,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及融入城市的途径十分有限。通过进城打工和熟人的帮助积累原始资金和经验,然后创业当老板并最终在本市购房入户是他们实现在迁入地永久定居的唯一方法<sup>[25-26]</sup>。就投资型移民而言,对其定居意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年龄、性别、学历、好朋友数量、户籍以及地理等因素,而受社会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少,表明投资型新移民选择在迁入城市定居,所考虑的并非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而是其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以及户籍壁垒等制度性因素。

## 5 结论与讨论

实证表明,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定居意向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下述特点:

(1) 新移民的定居意愿较高,超过一半的新移民有在所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就其内部而言,投资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移民次之,劳力型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弱。

(2) 新移民的个人定居能力与定居意愿呈弱相关关系,反映了定居能力与定居意愿的不匹配:希望定居的新移民不具备定居能力,而具备定居能力的新移民却不愿意留在所在城市。

(3) 女性、高学历、高收入、在本市居住时间较长、拥有本地户籍和当地社会资本、具有本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生活满意度较高以及以中西部城市为迁入地的新移民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其中,收入、户籍、社会网络、社会认同和地理因素等是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4) 由于智力型、劳力型和投资型新移民遵循不同的路径融入流入地社会,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对智力型新移民而言,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对劳力型新移民而言,职业、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认同和地理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对投资型新移民而言,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较强而文化因素的作用较弱,人力资本、社会网络、户籍和地理因素是影响其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如何实现城市移民与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相结合,逐步建立完善的新移民安置机制,引导新移民融入城市社会,是解决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之下,新移民定居意愿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流入城市的新移民承受了制度变迁与身份变迁的“双重”压力。实证表明,城市新移民作为一个多样化的群体,其定居意愿以及影响机制正逐渐分化。因此,在新移民定居城市问题的政策应对上,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针对不同类型新移民的实际需求,逐步消除制度壁垒,帮助新移民重塑市民身份,促进新移民在迁入地城市实现政策融入和身份融入,以实现新型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 [1] 王国霞,秦志琴,程丽琳.20 世纪末中国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基于城市的视角[J].地理科学, 2012,32(3): 273-281.
- [2] 王德. 1990 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迁移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 2004 (1): 40-46.
- [3] 廉思. 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4] 国务院研究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 北京: 言实出版社, 2006.
- [5]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63-76.
- [6] 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等. 徘徊在三岔路口: 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比较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09(6):58-66.
- [7] 王龙龙.乡土关系的嬗变与重构: 城市新移民的新兴社会关系研究[D]. 浙江杭州; 浙江大学, 2009.
- [8] 李志刚.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J]. 地理学报, 2012,67(2): 189-200.
- [9] 李志刚,刘晔.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J]. 地理学报, 2011,66(6): 785-795.
- [10] 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1(6):19-30.
- [11] Zhu Y., Chen W.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J].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 2010(16):253-267.
- [12] 朱宇,林李月.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 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J].地理科学, 2011,31(3): 264-271.
- [13]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J]. 社会学研究, 2009(4):61-87.
- [14] 鲁奇,黄英,孟健,等.流动人口在北京中心区和近远郊区分布差异的调查研究[J].地理科学, 2005,25(6): 655-663.
- [15] He C., Jin W.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29(3): 157-171.
- [16] 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 (6): 86-113.
- [17] 朱宇.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J].南方人口, 2004,19(3): 21-28.
- [18] 任远,戴星冀.外来人口长期居留倾向的 logistic 模型分析[J]. 南方人口, 2003,18(4): 39-44.
- [19] 朱宇.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基于福建省的调查[J].人文地理, 2012,27(3): 1-6.
- [20] Fan C.C.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J]. The China Review, 2011,11(2): 11-42.
- [21] 姚俊.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调查——基于苏南三市的实证分析[J]. 城市问题, 2009 (9): 96-101.
- [22] 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1,31(2): 153-169.
- [23] 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2): 46-54.
- [24] 夏怡然.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 2010 (3): 35-44.
- [25]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26] Zhu Y.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7(31):65-76.
- [27] 李志刚,刘晔,陈宏胜.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 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30(10): 1910-1920.

[28] 项飏.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